

精神符号学* 的兴起

孙少文

摘要：精神符号学，又称精神文化符号学，是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融合了中西现代符号学成果和本土传统符号学思想资源的新兴符号学学科。本文首先论述该学科的出现既有时代问题的现实缘由，也是符号学在国内外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从学科内涵、学科内部对话和基本特点、当下理论和应用进展三方面系统梳理，着重阐释关键概念，对比分析精神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异同，最后指出学科未来发展可能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精神，文化，精神符号学，精神文化符号学

The Rise of Semiotics of Mind

Sun Shaowen

Abstract: Semiotics of mind, also known as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is a rising discipline as the combination of modern semiot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semiotics resources. Firs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of this discipline,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current era,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matur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at home and abroad. Basing on that, key concept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sub-disciplines,

* 李思屈提出的“精神符号学”和张杰、余红兵提出的“精神文化符号学”，两个学科各有其主张和侧重，但在研究对象、目的、问题等关键方面，都围绕“精神”和“文化”两方面展开。为行文之便，本文冒昧地将二者统称为“精神符号学”；在具体论述时，本文谨遵两方学者各自提出的学科名。

□ 符号与传媒 (24)

namely semiotics of mind and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re elabo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connotations of the disciplines, the internal dialogues and intrinsic features within them, the curr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problems the discipline may face and need to solv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jingshen*, culture, semiotics of mind,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1019

2015年,学者李思屈撰文《精神符号学导论》,首次明确提出精神符号学学科建设,至2021年发表《精神符号学的概念、方法与应用》,对这门学科的关键概念和发展做进一步阐释。2020年,学者张杰、余红兵在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发表《精神文化符号学宣言》(“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2021年,在《符号与传媒》上与李思屈对话,发表《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较完整地构建了“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设想。这四篇文章共同构成了精神-文化符号学这门新符号学学科建立的纲要。与之呼应的文章已经有Chen & Yao (2021),陈中、姚婷婷(2021),李涛(2021)等。

说一门新学科兴起,就意味着有各种要素在推动其产生、建立,并指向未来发展。这些要素主要体现在:兴起的背景和契机、学科内涵、当下理论和实践的进展、学科的特点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

一、学科缘起

(一) 现实缘起:为什么研究“精神-文化”?

在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21世纪,结构被解构,意义被消解,历史虚无、精神虚无蔓延,随着增强现实(AR)技术、虚拟现实(VR)技术、人工智能的突起,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遭受质疑和挑战。在价值追求、意义交流、思维创新,以及如何对待真实世界、虚拟世界等方面,人们面临着个体、集体、社会层面上的精神危机,“逃离体”(如“逃离北上广”)、“躺平文化”揭示了个人价值追求危机;而“废话文学”“内卷”等热词是这个社会意义阙如的精准叙述;被科技推向繁荣的文化市场因精神内核缺失

而在创新上后劲不足，如高科技制作的影视文艺作品故事却套路化、“烂尾”，地方旅游文化塑造及推广模式雷同等；2021年被誉为“元宇宙元年”，“metaverse”也被《柯林斯词典》（*Collins Dictionary*）收入2021年度热词前十榜单^①，“元宇宙”概念的大热又将人类进一步推向虚拟，引发对真实和人主体性的忧虑。

精神危机带给人文学者紧迫的使命感，尤其是对以意义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符号学研究者。精神亟待专门研究，以助我们把握人类精神文化运行规律和特征，从而为时代命题寻找策略。

（二）理论前提：为什么是符号学？

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学理逻辑和精神逻辑。前者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向“事实世界”的逻辑维度，后者是面向“价值世界”的精神维度。（李思屈，刘研，2013，p. 32）因此，对精神危机所体现的现象事实、所引发的价值危机问题的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应有之义。那为什么偏偏是符号学？这是因为符号学的建设和人文学科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进行的，它和人文科学具有整体的、结构的相关性。（李幼蒸，2009，p. 8）从20世纪初酝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在国际学界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发展到现在；在国内，继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后，符号学在语言学、文艺理论、传播学、大众文化研究等人文社科领域逐渐成为一门通学。

符号学之所以能用在精神文化领域，也离不开它本身的学科和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符号学，其发展证明了其“提供了一套极为犀利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对付当代文化纷乱杂陈的课题”（赵毅衡，2016，p. 8）。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人类学；罗兰·巴尔特和克里斯丁·麦茨分别在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中以符号学方法进行突破，开创了全新的工作领域；保罗·利科涉足哲学和符号学的交叉地带；翁贝托·艾柯将符号学研究领域从语言学、文学推广到文化与传播领域；赵毅衡用符号学的方法将叙述学从对传统的叙述形式的分析拓展到广义叙述学，又名符号叙述学。

^① 《柯林斯词典》官方网站于2021年11月24日公布该年度十大热词，详情可参阅官方网站新闻，<https://blog.collinsdictionary.com/language-lovers/get-your-crypto-at-the-ready-nfts-are-big-in-2021/>。

□ 符号与传媒 (24)

第二,符号学和人类精神文化、精神伦理紧密联系。卡西尔文化符号论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通过符号活动创造精神文化,提出“人-符号活动-文化”三位一体模式。符号伦理学认为,人的符号活动包含在整个生命体符号活动的符号域中。从符号活动是人所独有,到人类的符号不过是自然符号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反思让符号学走了个否定之否定的大圈。然而人又是“符号学的动物”,其独特性在于具备能够反思符号活动后果这一“元符号能力”,这一伦理关注呼应了符号学最开始的名称“症状学”,其作为医学上的一个分支关注病理症状。(李思屈,2015,p.15;赵星植,2021,pp.212-218)

第三,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从引介、运用到反思、批判,从借鉴、学习到追溯、挖掘本土符号学思想,中西融合的符号学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支脉。“中国符号学”一词有三个所指:作为文化历史材料(历史),作为当前学术活动的地理范围(地域),作为当前一种部门符号学的综合领域(学术)。(李幼蒸,2007,pp.779-780)

在作为文化历史材料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如汉字符号学、《周易》符号学、老庄符号学、唯识学符号学等部门符号学涌现。在地域上,有以四川大学为重镇的符号学西部学派,并且有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等五家研究机构发起组建的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地域发展呈点、线、面推进,加强了中国符号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交流。在学术理论上,一方面反思符号学西方传统路径的不足,对其进行整合、完善,如在现象符号学、存在符号学、伦理符号学等领域;另一方面,符号叙述学、认知符号学、性别符号学等部门符号学拓展了符号学诸多领域。(唐小林,祝东,2012)

中国符号学在以上三方面大力推进,正是这些发展,才让中国学者面对所观察到的现实问题,思考符号学的出路;也正是这些已有的理论发展成就,让中国学者反思得出需要融合中西方符号学,而不能照搬西方符号学传统思维、范式和方法。

二、学科内涵

正如开篇所言,本文所讨论的精神-文化符号学是指李思屈倡导的精神符号学和张杰等人提出的精神文化符号学两个学科。两个学科内涵各有主张和侧重。在进行学科内涵阐释之前,有必要追溯两个学科主倡者和代表研究

者的学科背景和学科立场，以便更好地理解精神 - 文化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多元内涵。

张杰和余红兵是从文艺批评理论传统，尤其是俄国符号学文艺批评传统，走向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张杰（2002，p. 138）总结出西方文艺探索的一个共同原则，即“以解决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主要矛盾为着眼点，或是以作者为中心，或是以文本为中心，或者干脆脱离作者与作品以读者为中心”。他指出这个原则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清晰性，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在认识方法上往往强调对认识对象的总体认识，在具体分析文艺作品时，多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探讨，以求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由此与西方文艺批评原则互补。余红兵（2012）在分析文化符号学时，强调了人的主体性，而这个主体性，在张杰、余红兵（2021）的精神文化符号学论述文章里，等同于精神性。

李思屈的前期研究兴趣多集中在符号传播、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诸领域，如下文将会写到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在对价值、文化等精神符号学关键概念的理解上有重要影响，例如对“小文化”和“大文化”的区分，从符号的商业价值到符号的精神价值推进这一学科内涵论述的理路等。同为该学科提倡者之一的臧金英（2020）在回溯传播符号学发展过程时，明确指出传播符号学渗透着人类精神主题，暗含精神符号学的学理基础。

（一）学理基础

学理基础在这里指的是精神 - 文化符号学以什么概念、思想作为其根本的、区别性的理论基础。

精神文化符号学主要是在西方符号学思想及解构主义基础上，更强调中国传统美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老庄学说。该学科将二者整合起来，一方面认为意义多元，意义在时空层面无限衍生；另一方面，揭示看似简单的符号意义的无限，从无限、不定的意义中寻找深层的规律，分析从意义的“无为”到“有为”这么一个符号学理想实现的过程。

就精神符号学而言，对符号的基本定义是“符号说明意义的不在场”，“通过在场唤起不在场者”。（李思屈，2021，p. 11）换言之，精神符号在场，或曰精神的能指在场，但是所指的精神不在场，精神符号学通过在场的、具体可感的符号来探究抽象的精神。

□ 符号与传媒 (24)

(二) 学科研究目的

精神文化符号学所追求的是揭示符号本身或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运行的规律，同时又不被符号的解释束缚；强调参与符号活动、阐释符号的人的主体性，在解放符号意义的同时，扩展人的认知概念，让“本应自由的人摆脱各种社会的、伦理的羁绊，自由地去思考”。概言之，通过自我的修为，达到符号认知中“天人合一”的“道”的境界，并将其视为终极目标——“真知”。(张杰，余红兵，2021；陈中，姚婷婷，2021)

精神符号学是从符号，即具体、可感知的载体，来研究人类抽象精神(如民族文化等)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从而为精神信仰、价值传播等时代精神文化问题给出学理层面的解释、回答。相比精神文化符号学在提出时对自身修为路径的侧重，精神符号学偏向集体、社会层面。

(三) 研究对象和问题

精神文化符号学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符号活动及其内在精神联系，即符号与对象、符号与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人的精神活动是其内在精神纽带。该学科探究各种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活动，揭示各种精神的联系，挖掘意义，最终实现中国传统认知模式里的“道”，即“天人合一”的目标。

精神符号学研究对象更为具体，专注人类精神现象的符号，或言精神显现于感性媒介的符号载体。具体而言，关注文化器物层和制度层的精神，即“小文化”，研究“小文化”里精神的运行规律、特征和传播，以小窥大，进而把握和揭示“大文化”，创新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李思屈，2021，p. 4)

(四) 研究方法

两者以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基础，与中国本土或经验实证的方法结合。具体而言，精神文化符号学强调的是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多元性，除了运用西方偏向理性、科学思维的符号学方法，即张杰等人所说的“思知”(cognition via knowledge/abstraction)，如归纳、演绎等，还运用中国本土综合性、感悟式的思维方法，即“体知”(embodied cognition)，或言“心知”(the unity of three-tiered self-cultivation)，如“三心合一”的修己方式。(陈中，姚婷婷，2021)

精神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质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结合：一方面，通过逻辑推理、概念模式建构来解释人类精神活动与符号的关系，如研究在人类

意识和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符号，然后通过溯因推理（abduction）得出人是伦理的动物这一现实（李思屈，2015，p. 15），建构如“言－象－意－道”（DIMIT）这种中国特有的符号意义解释模式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符号实证研究，如观察日常的社交往来，就其中的创造性仪式进行实证研究。

三、精神－文化符号学内部共识、交锋，和共同的学科特点

（一）关键问题的共识与交锋

第一，关于符号学和符号的理解。

精神文化符号学和精神符号学有两个重要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是，二者都对西方符号学的科学路径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批判其在二元区分主体的人和客观的对象的基础上偏重客观对象分析的取向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的主体性。如李思屈（2021）区分了符号学所研究的“意义”的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称性意义，第二层是价值性意义，前者持续地受到西方符号学主流关注，而后者却受到忽视。张杰、余红兵（2021）也指出西方符号学研究传统重客体、轻主体，重分析、轻综合的不足，认为符号学所研究的基本符号关系都是客体的对象和主体的人相互作用的产物，需要关注主客体的交互，而西方符号学研究所采用的理性分析方法和自然科学式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演绎等，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观察角色，而忽视了人之主体性。

另一个共同点是强调所分析的符号与人、文化息息相关。无论是精神符号学还是精神文化符号学，研究的都是人所特有的、打上人类文化烙印的符号，与别的符号类型比如动物的信号之类不同。符号学研究偏重指称性意义，即“意思”，包括人类符号、动物指号、物理指号、植物指号等的含义；精神符号学研究偏重精神性价值，即“意义”，也就是人的价值性的意义。

在符号和符号学的具体定义上，精神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有形的符号显现传播和无形的价值意义，后者侧重符号意义的主观性、综合性和多元性。李思屈将符号理解为精神的载体，即承载了一定精神内容的物质形态。精神是抽象的，它需要可感知的载体来体现，这种感性的体现就是精神的符号化。精神符号学不同于当下流行的普通符号学，“尤其不同于那些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符号现象’或‘研究表征行为’的各种符号学定义”（李思屈，2021，p. 5）。张杰（2021，p. 9）等人认为，

□ 符号与传媒 (24)

“揭示符号活动中的多元意义，用多元解读的思维方式从事符号研究的科学”就是符号学，强调符号作为一个过程，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外在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正是这种主客体的互动，才使得符号学研究对象和方法不能只偏重客体或只强调客观分析，还要兼顾主体精神、意识，兼顾综合性的、感知性的研究方法。

第二，关于精神，和关于精神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无论是精神符号学还是精神文化符号学都指出精神和文化二者密切相关，是研究的核心对象，但在对精神与文化的理解及联系与区别上，二者各有不同。

张杰等人从对西方精神研究的反思来说明精神内涵，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来说明精神与文化的联系。他们所讨论的“精神”是相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言的，即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通过观察来分析的“精神”，而是人的主体性内在包含的抽象特质——人不仅是观察的主体，也是参与其中的主体的抽象存在，这样的“精神”（*Jingshen*）比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更为综合、主观，是思维（*mind*）、创造性（*creativity*）和活力（*vitality*）的集合。（张杰，余红兵，2021，p. 3）这种综合性的“精神”体现为中国古典文化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与人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精神和文化必然相关、不可脱离。

李思屈所言的“精神”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的“精神”对立，他认为黑格尔回答的是“精神是什么”的问题，将精神作为预先的本体，从这个前提出发，通过现象的演化来分析精神；精神符号学回答的是“什么是精神”的问题，精神是待在的存在、是终点，精神的各种符号载体是起点。在强调精神和文化的联系时，精神符号学更侧重说明二者的区分。精神是“大文化”，即时代的文化精神，是激发创新精神的根源，而抽象的精神必须借助媒介，媒介化就是精神的符号化，体现为文化器物、制度、仪式等具体的文化样式，这些是“小文化”。精神符号学通过提炼“小文化”里的当代价值标识、文化精髓来研究“大文化”；一般的文化符号学把“精神文化”理解为哲学、艺术、价值观等的纯粹精神形态部分。李思屈将精神符号学以文化的“大”“小”之分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符号学。

（二）精神符号学的基本特点

如上所述，在精神、符号、文化三个关键问题上，精神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确有观点的交锋，但是二者之所以一并归纳到“精神 - 文化符号

学”，是因为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共识，共同体现一门合一的学科概括性特点：

第一，研究旨归的抽象性。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精神文化符号学是以人类各种精神文化活动为研究对象，涵盖面较广，而精神符号学是对可感知的符号如文化器物和符号活动如文化制度、仪式进行研究，对象较为具体，但是二者殊途同归，都落到对人类抽象精神的规律、特征的把握，旨在解决时代精神文化问题，或达到精神文化符号学所认为的终极认知——“道”的层面。

第二，方法的多元性。精神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思知”和“体知”的结合，尤其在偏重“思知”的当下倾向于“体知”方法；精神符号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既包括阐释分析，也在研究具体实际精神符号问题时采用实证、经验的方法。

第三，学科的使命性和前瞻性。精神危机的现实缘起赋予这门学科提升人类精神之维的学科使命，如精神文化符号学强调修己，精神符号学关注时代文化创新命题。这门学科显示出符号学对人类精神研究的趋向，这种研究不同于西方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是基于中国老庄等哲学和美学传统的综合的精神研究，一定程度上引领人类精神革命的新学科范式。（臧金英，2020）

四、当下研究的进展

精神符号学、精神文化符号学是近几年才正式兴起的学科，许多问题尚待厘清、推进，但当下已取得较多实质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精神”概念进一步明晰。

陈中、姚婷婷（2020；2021），Chen & Yao（2021）从精神文化符号学所言的人的精神纽带出发，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来具体阐释符号活动的认知过程，即“三心合一”观。“三心合一”为“心身合一”“心物合一”“心心合一”，这种“心知”的认知模式呼应了精神文化符号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人参与符号过程，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他的参与角色，而非旁观分析角色；从“心身合一”到“心物合一”，最终达到“心心合一”，这个认知过程的递进，表明意义的阐释是如何经多元、无限的途径，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道”或“真知”这一终极目标的。同时还有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和符号学问题论述之间进行语言和思维的转换的问题，

□ 符号与传媒 (24)

对此陈中、姚婷婷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精神价值”这一研究问题内涵得到丰富。李涛(2021)指出精神价值包含“生活精神价值”“生命精神价值”和“人类文明精神价值”，这些解释意义都不在文化艺术之中，也不能禁锢在科学技术之中，因此价值是文艺、科技、价值三因素中独立、核心的存在，并且是文艺追求、技术探寻的目的和动力。精神价值内涵的丰富，有助于把握学科之间的关系，例如基于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李涛认为精神符号学直接指出了动画符号学的本质，将动画符号学研究视为精神符号学的子学科和具体运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跨文化对比研究和 DIMT 符号意义分析模式。

2021 年，几乎与提出精神文化符号学同时，张杰(2020)撰文《反思与启示：人文精神助力社会发展》，对“精神文化”展开了跨文化对比研究，并将精神研究提高到民族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基于对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回溯和分析，认为俄罗斯人文社会发展艺术性和精神性探索兼顾，在精神探索上更关注内在世界，因此自信、韧性构成其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与其相通之处，二者可以相互借鉴。

李思屈在 2003 年就提出基于东方阴阳观念、中国汉字符号特点而发展出来的“言-象-意-道”(DIMT)符号分析模式，分析意义的产生和传播。该模式中，阴阳运动是言、象、意和道四种符号要素的互动，“阴”是符号的不可见部分，可理解为“所指”，而“阳”是符号的可见部分，可理解为“能指”。这个模式较好地阐释了精神符号学所认为的“通过在场者唤起不在场者”的符号学学理基础。该模式最初提出是用于分析广告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播，当下已被广泛应用于对海报、影视作品等符号文本体裁的分析。(张纾舒, 2017; 焦晓虹, 2018; 孟好, 2019; 张纾舒, 王丽, 2021)如在神话电影符号意义解读上，张纾舒、王丽根据 DIMT 模式分析《哪吒之魔童降世》，在文化遗产、电影演绎、精神实质三方面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既证明 DIMT 这一东方符号学意义分析模式的阐释力，也践行了精神符号学学科的时代使命。

第三，学科内部构成、学科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论述。

伦理学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揭示了人作为符号动物如何从符号意识中产生责任，说明了符号学并不缺乏意识形态承诺，正是这种面向构成了传播正义论作为精神符号学分支的一个基本依据。李思屈(2010; 2021)、李涛(2021)、臧金英(2020)等人认为，精神符号学由于将价值、符号的传播内化为基本概念，所以与动画符号学、传播符号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学

科内部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的研究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完善。

五、未来研究展望

精神-文化符号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建设，包括关键概念辨析、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等需要进一步加强。

首先，关于“精神”的内涵，尤其是从精神和文化的联系与区分的角度，一个可推进的路径就是精神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之间更多的对话。精神符号学从具体的文化入手，强调了精神与文化的区别，文化内部“大文化”“小文化”的区分；精神文化符号学以宏观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为对象，重在精神、文化的联系。二者的研究旨归都落实到抽象精神层面，殊途同归。“殊途”除了因为不同的学科背景，其他原因是什么？这种“殊途”能启发对“精神”“文化”概念的什么新解？

要明确“精神”的内涵，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英译不统一。李思屈（2021）将“精神符号学”翻译成“Semiotics of Mind”，“精神”对应“Mind”。放在当下国际符号学研究语境下，“Mind”多在生物学、认知科学领域使用。如以“semiotics”和“mind”作为关键词搜索国际学术刊物，大多数文章是从心理学、认知学、生物学的角度去讨论二者的关系。张杰、余红兵（2020；2021）将“精神文化符号学”译为“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解释“*Jingshen*”包含“mind”“creativity”和“vitality”三层含义。这三个词在中西语境下内涵各有不同，需要进一步辨明。李涛（2021）将“精神符号学”译为“Mental Semiotics”，“精神”对应“Mental”。英译术语的统一问题一方面是对“精神”概念的精确化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精神-文化符号学走向国际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对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符号资源挖掘及现代符号学式的阐释。既然精神-文化符号学是中西符号学研究交融的产物，那么中国符号学传统资源的利用必不可少，需要对传统典籍进行精神-文化符号学式的阐释和解读。这种解读不再是套用西方的符号学话语体系，而是建构和使用本土的符号学话语体系。其过程会经历两道程序：将千百年前的古文内容解读成现代话语，用符号学思维解读现代话语。这两道程序一方面需要文献解读和符号学理论建设同时推进；另一方面需要跨学科协力，因此精神-文化符号学既需要和其他符号学学科对话交流，也需要和符号学学科之外的文献学、文艺学、美学、哲学等传统学科加强沟通。

□ 符号与传媒 (24)

最后，精神 - 文化符号学和其他较为成熟的符号学学科之间的对比研究。精神 - 文化符号学学科发展渊源、研究对象使其与发展成熟的部门符号学学科密切相关，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和传播符号学、动画符号学、伦理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的关联，精神符号学还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仪式等。当下，针对这些文化现象，已有部门学科建立，例如民俗符号学；或有学者推进研究，例如贾佳的《打扮：符号学研究》(2018)。这些部门符号学和具体符号问题的研究与精神 - 文化符号学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该如何融合、对话？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印证精神 - 文化符号学在符号学研究中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独特性。

此外，由于精神 - 文化符号学是因应时下社会各个层面的精神危机而出现的，观照、反思现实问题并提出可能答案是此门学科建设的初衷，也就应该成为未来研究需要践行的使命。精神世界迷茫导致创新的精神激励和价值导向缺失，时代创新后劲不足。时代精神总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化：从古希腊、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前，神话和上帝是西方精神的中心符号，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则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符号（李涛，2021），那么在以人工智能、互联网为主导的数字信息时代，时代精神就应该是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当今蓬勃发展的文化科技产业离不开精神 - 文化符号学对精神、文化的研究。本文认为精神 - 文化符号学可以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该问题做双向推进：

微观层面，在人工智能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今天，如何区别人的精神和机器的智能、人的创作和机器的创作？精神 - 文化符号学可以对人的精神、主体性的阐释提供新的见解。

宏观层面，无论元宇宙或虚拟世界的概念是否昙花一现，人类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字虚拟世界的构建这一事实。虚拟空间社会体系的建立涉及伦理道德、虚拟世界社会秩序以及对现实秩序的冲击等一系列问题，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实质上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新的社会秩序建立的核心是‘引领性的社会价值观’，它还是一种文化精神问题”（李思屈，2021，p. 4）。基于我国文化传统和特色，价值导向在文化多元和保持本土文化中显得非常必要，而导向型的文化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能够起到巨大的稳定作用（余红兵，2021）。概言之，文化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而当下的时代精神是人文与科技融合；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实质是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引领性的社会价值观。这一系列逻辑的推进，贯穿了

精神—文化符号学从研究对象到研究目的的全域。由此，精神—文化符号学需要更加专注于文化科技所呈现的符号形式，揭示其背后的精神内涵和本质，在看似时髦的表象中把握文化精神的规律和本质，助力必要的导向型价值观的形成。

引用文献：

- 陈中,姚婷婷(2021).三心合一:精神文化符号学认知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知”.符号与传媒,1,14-25.
- 胡喆,温竞华(2021-11-21).什么是元宇宙?为何要关注它?新华每日电讯,4版.
- 贾佳(2018).打扮:符号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焦晓虹(2018).以东方符号学“DIMIT”模式解析电视节目《朗读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9,2,164-168.
- 李思屈(2003).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I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李思屈(2010).传播正义论:基于普适正义的传播学理论建构.中国传媒报告,7,12-17.
- 李思屈(2015).精神符号学导论.中外文化与文论,3,9-19.
- 李思屈(2021).精神符号学的概念、方法与应用.符号与传媒,2,1-24.
- 李思屈,刘研(2013).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8,29-37+126.
- 李涛(2021).动画符号学建构的阿基米德点探析:基于精神符号学的研究.符号与传媒,2,25-38.
- 李幼蒸(2007).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幼蒸(2009).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文艺理论研究,3,2-12.
- 孟好(2019).基于“DIMIT”模式解析国家形象宣传片——以《中国一分钟·地方篇》为例.青年记者,8,78-79.
- 唐小林,祝东(主编).(2012).符号学诸领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余红兵(2012).文化符号学的新视角:符号的感知与意义的半自动生成.俄罗斯文艺,2,119-124.
- 余红兵(2021-05-06).“以文化兴国”的理据.中国社会科学报,7版.
- 臧金英(2020).AI时代精神符号学与文化产业的内在逻辑.传媒观察,8,53-59.
- 张杰(2020-12-11).反思与启示:人文精神助力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6版.
- 张杰(2002).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33-139.
- 张杰,余红兵(2021).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符号与传媒,1,1-13.

□ 符号与传媒 (24)

- 张纾舒 (2017). 张艺谋电影海报中的东方智慧——基于 DIMT 模式的符号学分析. *当代电影*, 3, 197 - 200.
- 张纾舒, 王丽 (2021). 基于 DIMT 模式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影像符号解码. *电影评介*, 13, 107 - 112.
- 赵星植 (2021). 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 (1980—2020).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6).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Chen, Z. , & Yao, T. (2020). The Cognitive Paradigm of Jingshen: “Unity of Three-tiered Self-culti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6, 4, 535 - 550.
- Chen, Z. , & Yao, T. (2021). Chuang Tzu’s Selflessness: Mind-state and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7, 3, 387 - 399.
- Zhang, J. , & Yu, H. (2020). 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6, 4, 515 - 534.

作者简介:

孙少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叙述学。

Author:

Sun Shaowe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tics and narratology.

Email: verasun217@foxmail.com